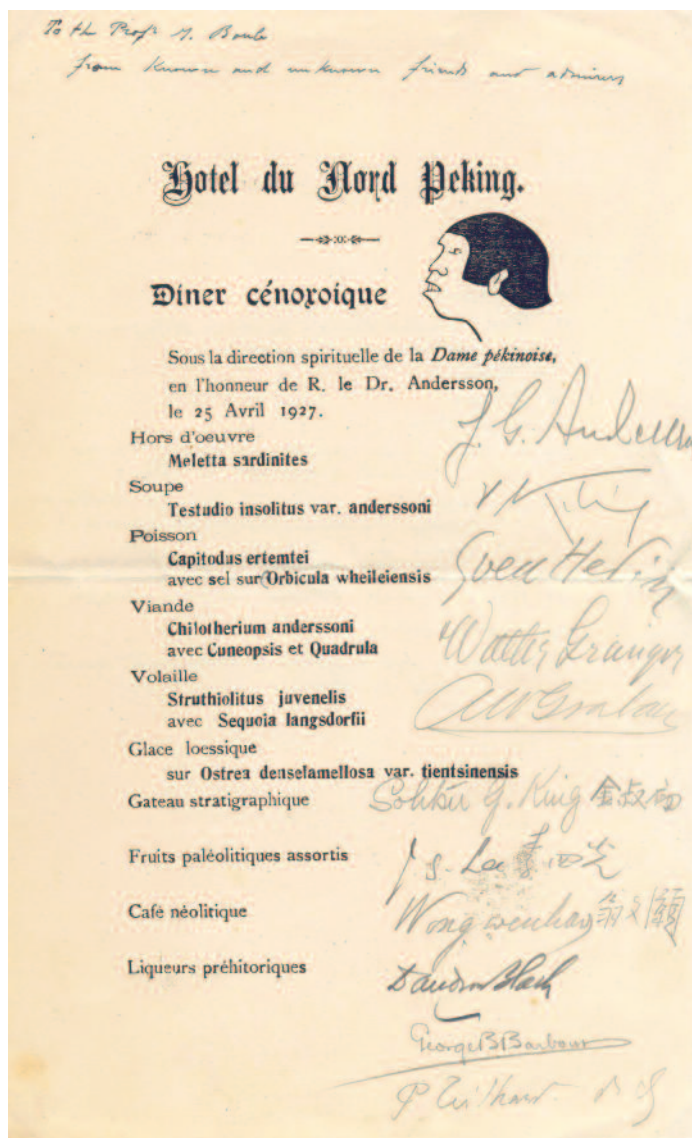


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

從德日進寄至法國的一張餐卡看起



戴麗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5 期 2013.11

一、前言

有關現代科學在中國之發展，一般認為以地質學為較早且較具成果。這個看法，先是出現在當時人物的評論中，後來的研究者亦表贊同。例如丁文江在一九三六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認為，中國現代科學研究的歷史不超過二十年，而且是始於民國元年北京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地質調查所之前身）的成立。^①另外，曾經在中國的地質調查所工作、戰後到美國地質調查所任職的趙景德在一篇分析共產中國地質學發展的文章中亦稱：「在一九五〇年以前，中國地質學有五十年左右的歷史，並不比西方落後很多，不像物理或工程學。」^②近期許多當年參與地質調查所工作的研究人員在其回憶文章中，亦表達同樣的看法。^③

至於為何有此現象，論者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第一、地質學有其經濟上的應用價值，而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政府急於發展工業，對地質科學因此較為重視。^④第二、地質學與物理或化學等實驗科學不同，其方法與其它自然史學科一樣，以經驗和歸納為主，可能讓第一代中國留學生感覺較易入手。這點基本上是美國學者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提出的論點。這位作者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一書中就認為，地質學基本上是一種歷史科學，其所用的經驗方法與中國傳統學術中所用的方法相當類似，二者所提出的是有關起源與發展等歷史問題，所用的方法是分類與歸納的方法，所得結果又是用一般語言來表達，不似抽象的數理語言一般難懂。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第一代中國留學生，傾向於選擇醫學、生物、地質等具經驗性的學科為其專業的原因。^⑤第三種看法則是：地質學是一種具有區域性、地方性特質的科學，中國地質研究一旦做好，便能在全球性的相關科學知識上有所貢獻，受到肯定，所以容易吸引有志之士的投入。^⑥

① Ting Wen-Chiang,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Asia* 36.2 (1936): 131-134.

② Edward Ching-Te Chao, "Progress and Outlook of Geology," in *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edited by Sydney Henry Gould (Washingto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60), pp. 497-521, p. 500.

③ 見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

④ 許多論著都提到這點，例如可參考楊翠華，〈歷史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1986）：319-334；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5。

⑤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6, 229. 前述楊翠華文章中亦提及此觀點。

⑥ 這個看法早期有楊鍾健提及，見楊鍾健，〈論研究有地方性科學之基本工作〉，《科學》18.1（1934）：5-11。

不論原因為何，地質科學在中國由於兼具了建制化較早開始、形式較完備、成果較豐富而明顯、社會評價較高等特性，使得該領域的工作人員很早就有意識地進行回顧工作。在民國時期，由於創業維艱，成立於一九一六年的地質調查所之工作人員皆不知該機構可維持多久，⁷所以在成立十五周年和二十五周年時，曾經舉辦慶祝會並出版紀念集。⁸然而在三十五周年前夕，由於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將原有的科研機構組織做一重整，地質調查所也隨之遭到解散，於一九五〇年走入歷史。⁹一九七八年，成立於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地質學會在沈寂多時後正式恢復活動，分別舉辦了地質調查所和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同時在一九八〇年四月成立了地質學史研究會，有計畫地進行史料整理的工作。此後出現的口述訪談、回憶性文章、概述性論集等等，數量之多，不勝枚舉。¹⁰在這一波建立學科史的運動中，除了許多散見於各個刊物或集子的短文之外，論述較完整的有一九九六年出現的第一本以機構為主題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史》，¹¹另外，同年還出版了曾經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學者之回憶性文集：《前地質調查所史（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¹²不過這些大多是中國地質學界工作者的作品，另外以歷史學角度寫成而論述較完整的，則有張九辰的《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於二〇〇五年出版。該書題目雖然標示了較大範圍，但實際內容仍是以地質調查所為主。種種這些群起效應與快速累積的結果，使得國際知名的科研刊物 *Isis* 在二〇〇七年秋季號中以專題方式再度探討現代科學傳入中國的課題時，也特別注意到地質科學這個領域。¹³

- ⁷ 由於當時經費拮据，而南京政府又有意將重要機關南遷，連創立者丁文江本身都沒把握原來設在北京的地質調查所是否能維持。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給胡適的信中曾經表示：「如可以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否則沒有法子的了。」見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臺北：胡適紀念館，1973增訂版），頁73。
- ⁸ 由該機構本身在周年紀念出版的有《中國地質調查所概況：本所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刊》（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1931）；《中央地質調查所概況：二十五週年紀念》（四川北碚：中央地質調查所，1941）。
- ⁹ 有關此全國性的地質機構組織變革，可參考陳夢熊，〈50年代初全國地質機構的一次大調整、大變動〉，收入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史研究所合編，《地質學史論叢·4》（北京：地質出版社，2002），頁171-172。
- ¹⁰ 地質學史研究會原本以研究古代地質資料和思想為主，後來也將觸角伸入地質學科史，並陸續出版了許多專著和期刊，分別從人物史、事業史、教育史、學科史、古代地學思想史等等角度切入，見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史研究所合編《地質學史論叢·4》，頁1。此不定期刊物分別於一九八六、一九八九、一九九五、二〇〇二年出了四個專號。第三個專號是「獻給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第四個專號是「獻給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八十週年」。有關該研究會成立後的活動和出版，另可參考下列文章條列式的介紹：王鴻禎、楊光榮，〈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1980年以來的學術活動及出版著作〉，收入前引書，《地質學史論叢·4》，頁238-242。
- ¹¹ 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1996）。
- ¹² 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
- ¹³ 該專號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共收有一篇序言及五篇文章，其中就有兩篇與地質學有關：Fa-ti Fan, "Redrawing the Map: Sci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sis* 98.3 (2007): 524-538; Grace Shen, "Murky Waters: Thoughts on Desire, Utility, and the 'Sea of Modern Science'," *Isis* 98.3 (2007): 584-596.

不過，地質科學是一涵蓋範圍相當大的領域，其中有許多分支學科，例如礦物學、岩石學、地震學、構造地質學、地層學、古生物學、礦床學等等，¹⁴其中各個分科的發展情況並非齊頭平等，而是有些發展較早、成果較顯著，而另一些項目則較遲緩，甚至嚴重缺乏發展的人才和設備。若從當年參與者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在民國時期，其各分支學科中以古生物學特別突出，而且一般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在華西方學者的倡導與推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被延攬為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開始領導古生物及地層學方面的研究。此外，當時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的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也將興趣從礦產調查轉到考古發掘。再加上李四光自英學成返國，對於地層古生物學亦有貢獻，使得當時「地質研究之空氣，為之一變，地質界同仁相率以高談海陸變遷生物進化為榮，而以煤田及礦床之研究為膚淺不足道。」¹⁵而且從葛利普到北大任教以後，不到十年間，中國地質學界從草創時期沒有任何古生物學家到「古生物學家人才輩出，古生物學研究盛極一時。……古生物學特別『吃香』」。¹⁶根據潘云唐所提供的一項統計數字，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地質科技人員共約 300 人，其中專門從事古生物研究者約 40 人，而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或兼職的就有 26 人。另外在研究中兼顧到古生物研究的大約有 24 人，其中 16 人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或兼職。也就是說，在整個相關科學社群的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一強的人數之工作內容與古生物研究有關，其中又有三分之二與地質調查所有關。作為一門現代科學，古生物學在中國可說是從這一代才開始，而且與地質調查所關係密切。當年來華的外國古生物學家，如葛利普、師丹斯基（Otto A. Zdansky）、步達生（Davidson Black）、步林（Birger Böhlin）、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等等，都或長或短地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¹⁷

另外，從古生物研究延伸到古人類研究，再擴及史前考古學研究之發展路徑於歐洲如此，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亦然。裴文中晚年在一篇回憶周口店工作的文章中就清楚地描述了這個過程：「一九二七年以前，龍骨山的發掘工作是屬於古生物學的，目的在於發掘動物骨骼化石；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工作是屬於古人類學的，目的

¹⁴ 這點從當年地質調查所組織內陸續設置的八個研究室可看出：地質調查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地性探礦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沁園燃料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地震研究室。此為一九三五年的組織架構，當時也是地質調查所的鼎盛時期，此後一直到該機構解散，組織架構改變不大。見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頁 21。

¹⁵ 謝家榮，〈近年來中國經濟地質學之進步〉，《地質論評》1.1（1936）：41-54, p. 42。

¹⁶ 黃汲清，〈論古生物學與地質學之連繫〉，《科學》30.4（1948）：98-102, p. 102。

¹⁷ A. W. Grabau, "Palaeontology," in Sophia H. Chen Zhen (ed.),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p. 152-165.

在於發掘人類的化石；到了一九三〇年，除了繼續發掘人類化石外，重要的是發現了石器和用火的痕跡，這樣，龍骨山的發掘工作就屬於考古學的範疇了。」¹⁸ 由此可看出，由洛克斐勒基金會出資、地質調查所與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合作的周口店發掘計畫是個動員了地質、古生物、古人類、史前考古學多方面知識的計畫。而且由於其成果豐富（包括了北京猿人與山頂洞人的發現與研究），當時被譽為是「中國科學界獲得的第一面世界金牌」。¹⁹ 丁文江就認為北京人的發現使得「國際科學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的重要」。²⁰ 除了名聲響亮之外，周口店研究的報告數量亦很可觀，以《中國古生物誌》丙種及丁種為例，²¹ 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八年就出版了近三十種有關周口店的化石研究成果，作者群中除了楊鍾健、裴文中和卞美年三人為中國籍學者外，其餘皆為外國作者。²²

這樣一個大計畫的根據地雖是中國地質調查所，但是促成計畫得以進行的經費來源，則絕大部分是依賴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的，並且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〇年間沒有間斷。²³ 事實上，地質調查所本身雖然是個官辦機構，但是其運作所需經費只有極少數是來自政府預算，絕大多數是依賴個人實業家、礦業公司，或者是外國基金會的捐助。一九三五年，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在一次概述中國科研事業的演講中感嘆到：「現在大多數人都知道地質調查所的成績，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的成功的秘訣和當事人的犧牲」。²⁴ 在成功秘訣的部份，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切中要害地提出三點。由於其敘述生動，此處便不嫌冗長地照錄如下：²⁵

第一地質調查所是一個極窮的機關。民國五年開始組織的時候，預定是十二萬元一年。從民國五年到民國十五年，每年實在收到的經費，平均不到五萬元。最少的時候，不到三萬元。到至今政府所給的經費也還不過七萬二千元。當事人的困難，可以想見。但是正是因為窮的緣故，所以免去了許多政治上的干

¹⁸ 裴文中，〈回憶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中國科技史料》1982.3：5。

¹⁹ 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頁104。

²⁰ 丁文江，〈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申報》，1935.12.4，頁8。

²¹ 創於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古生物誌》為不定期刊物，分甲、乙、丙、丁四種，分別出版中國古植物學、無脊椎動物化石、脊椎動物化石、古人類及文化四類專著。

²² 潘江，〈《中國古生物誌》與中國古生物學的發展〉，收入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頁42。

²³ 見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該書第28頁有協議書內容，其中載明洛克斐勒基金會撥出24,000美元，地質調查所從其經費中撥出4,000元作為周口店計畫之用，後者應是指當地貨幣，而非美元。後來實際發展的情況，洛克斐勒基金會有時在步達生的要求下追加補助經費，而地質調查所究竟有無支出，該書並未加以說明。

²⁴ 丁文江，〈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申報》，1935.12.4，頁8。此為丁文江在該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演講之講稿，該文分兩次刊登，刊登日期是1935年12月4日與6日。

²⁵ 丁文江，〈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申報》，1935.12.6，頁7。

涉。因為經費少所以薪水也比較的少，而且田野工作，是件極苦的事。很早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地質調查所工作極其緊張，而待遇極薄。起初還有人向所長亂薦條子，到以後不是對於地質真有興趣的人，提到地質調查所就搖頭不願意加入。因此在政治很混濁的環境之下，地質調查所居然能夠沒有受他的污染。民國以來，任何政府機關的長官都常常更換。惟有地質調查所始終祇有過兩個所長。現在的所長翁文灝先生任職已經十四年。管轄他的農商部實業部部長和代理部長的人，却更換了二十個以上！因為窮所以能不養閒人，所以所長能久於其事。這是地質調查所成功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從開辦以來，地質調查所即注意於實用問題。不但他們發現了許多新礦，而且調查地質礦產的人，隨時隨地幫開礦的人忙。不論是測量礦區圖，或是地質圖，化驗礦質，決定打鑽地點，祇要是真正辦礦的人，地質調查所都願意幫他工作，幫他計畫，個人與機關都不受任何的酬報。所以礦業界的人，都知道地質調查所是他們的朋友。遇有政治上的困難，大家出來替他說話。而且這二十年中，私人捐助他的款項，將近廿萬。所有地質調查所在北平的圖書館，解剖室，古生物與燃料研究室，地震室，都是用私人的捐款來建築的。政府的研究機關，而得到大量的私人捐助，恐怕祇有地質調查所一個。

第三地質調查所能夠充分的利用外國學者。近幾年來，許多研究科學的青年，受了民族主義的影響，往往不願和外國人合作，或受外國人指導。不知道這是大錯誤的。科學原來是西歐的產物。歐美人研究科學，至少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我們纔不過二十年。人家當然比我們高明，我們當然要與外國人合作，受外國人指導，方始有趕上人家的希望。反過來說，有許多政府機關僱用外國人，往往不能用他，而為他所利用。不知道外國人雖然比我們高明，但是他不會說中國話，不知道中國的需要。沒有相當的中國人作領袖來指揮他，不但他不能盡其所長，而且還要誤事。況且一般的外國科學家雖然比我們高明，但是能夠指導我們而又能到中國來的人，却是少數。地質調查所所聘用的外國人，都是頭等人才，都在長官指揮下，與他的中國同事合作，所以纔能收相當的效果。

由此可見，在丁文江的眼裏，當時的地質調查所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獲得良好成績，實在是因為不受政治污染、有私人捐助，以及有外國專家加入的緣故。

然而這些特點，尤其是第三點，在現在建立的學科史著作中被討論的比例卻相當小。例如王仰之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史》，全書二二一頁，關於外國專家參與者的部份僅有六頁，且只簡短地介紹安特生、葛利普、德日進、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

魏敦瑞等人。對於國外資助的部份，僅有二頁，並且誤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當作同一機構。²⁶又如張九辰的《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全書二八六頁，專門介紹外國學者與中外合作的部份共十二頁（頁144-155）。但是以其書末索引來查詢，本文將討論的十一位中外人物中，就有葛蘭階（Walter Granger）及金叔初兩人未見於條目。巴爾博（George B. Barbour）之名出現兩次，一次是出現在相片說明，另一次出現時卻有名字拼寫錯誤的情況。斯文·赫定（Sven Hedin）之名也簡短地出現在兩處。至於程裕淇、陳夢熊主編的《前地質調查所史（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書末附有〈地質調查所已故外國科學家小傳〉，概略介紹安特生、步達生、布林、葛利普、赫勒（Thore Gustaf Halle）、丁格蘭（Felix Tegengren）、德日進、魏敦瑞、師丹斯基等九位與地質調查所工作有關的外國學者，但其資料有許多如人名拼寫、生卒年代皆有錯誤或缺漏的問題，顯現出編者對這些人物的陌生。究其原因，這些作品從人物、教研機構、學會、期刊等方面入手，雖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但是由於其出發點是以「建制化完整」的「中國」地質學史的角度進行論述，所以敘述多集中在中國籍學者身上，而那些非屬於中國的，或是建制化初期異質的、建制後被邊緣化的面向，即使在學科初建時曾經扮演重要角色，還是被忽略。以當時這個綜合了地質學與史前學（包括古生物、古人類、史前考古學等）領域裏中外人員多項合作的情況來看，忽略了其中極重要的國際性格（cosmopolitanism），其實會無法掌握學科發展初期的實際面貌。

本文藉著德日進在中國期間寄給遠在法國的老師步勒（Marcellin Boule）的信件中所附的一張紀念餐卡²⁷——也就是年鑑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認為能夠透露更多實況的「無意的史料」²⁸——希望能夠還原當時這個領域的核心科學社群的國際性格。而且由於這件資料本身所蘊含的趣味性，筆者亦試著在其它相關書信及出版著作中尋找線索，希望能捕捉這群科學工作者的科學交遊情形。由此，我們可以在機構出版品之外，進一步推想這一小群跑遍中國大江南北的科學工作者彼此的職業情誼，以及他們對自己從事的研究所抱持的尊重專業的態度。

²⁶ 見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頁105。

²⁷ 步勒當時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學教授，也是古人類學方面的翹楚。德日進自一九一二年開始在他門下學習，並在一九二二年取得博士學位。德日進能夠到中國進行田野工作，有一部份是由步勒所促成。德日進旅華期間寄給步勒的信件，晚近已經集結出版，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923-1940)*, edited by Amélie Vialet and Arnaud Hurel (Paris: les Édition du Muséum;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Édisud, 2004)。本文中所討論的餐卡在此書信集中屬於插圖，未有任何說明與分析，編者並且將金叔初之名拼寫錯誤。關於德日進與步勒的關係以及書信內容之細節，筆者在另文中有較完整的分析，請見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95-161。

²⁸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rmand Colin, 1949), p. 24.

二、餐卡分析

(一) 餐卡內容：²⁹

北京北方飯店

新生代晚餐

在北京淑女的精神引領下
向安特生博士致敬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前菜：沙丁魚

濃湯：安氏口味稀有龜湯

魚類：惠氏蜆盤盛薄鹽鯉魚

肉類：安氏大唇犀配楔蚌和真珠蚌

禽類：春雞配朗氏紅衫

天津產密鱗牡蠣殼裝黃土冰淇淋

千層蛋糕

舊石器時代水果拼盤

新石器時代咖啡

史前甜酒

Hôtel du Nord Peking

Dîner cénozoïque

Sous la direction spirituelle de la *Dame pékinoise*,
en l'honneur de R. le Dr. Andersson,
le 25 Avril 1927.

Hors d'œuvre

Meletta sardinites

Soupe

Testudio insolitus var. anderssoni

Poisson

Capitodus ertemtei

avec sel sur **Orbicula wheileiensis**

Viande

Chilotherium anderssoni

avec **Cuneopsis** et **Quadrula**

Volaille

Struthiolitus juvenelis

avec **Sequoia langsdorfii**

Glace loessique

sur **Ostrea densamellosa var. tient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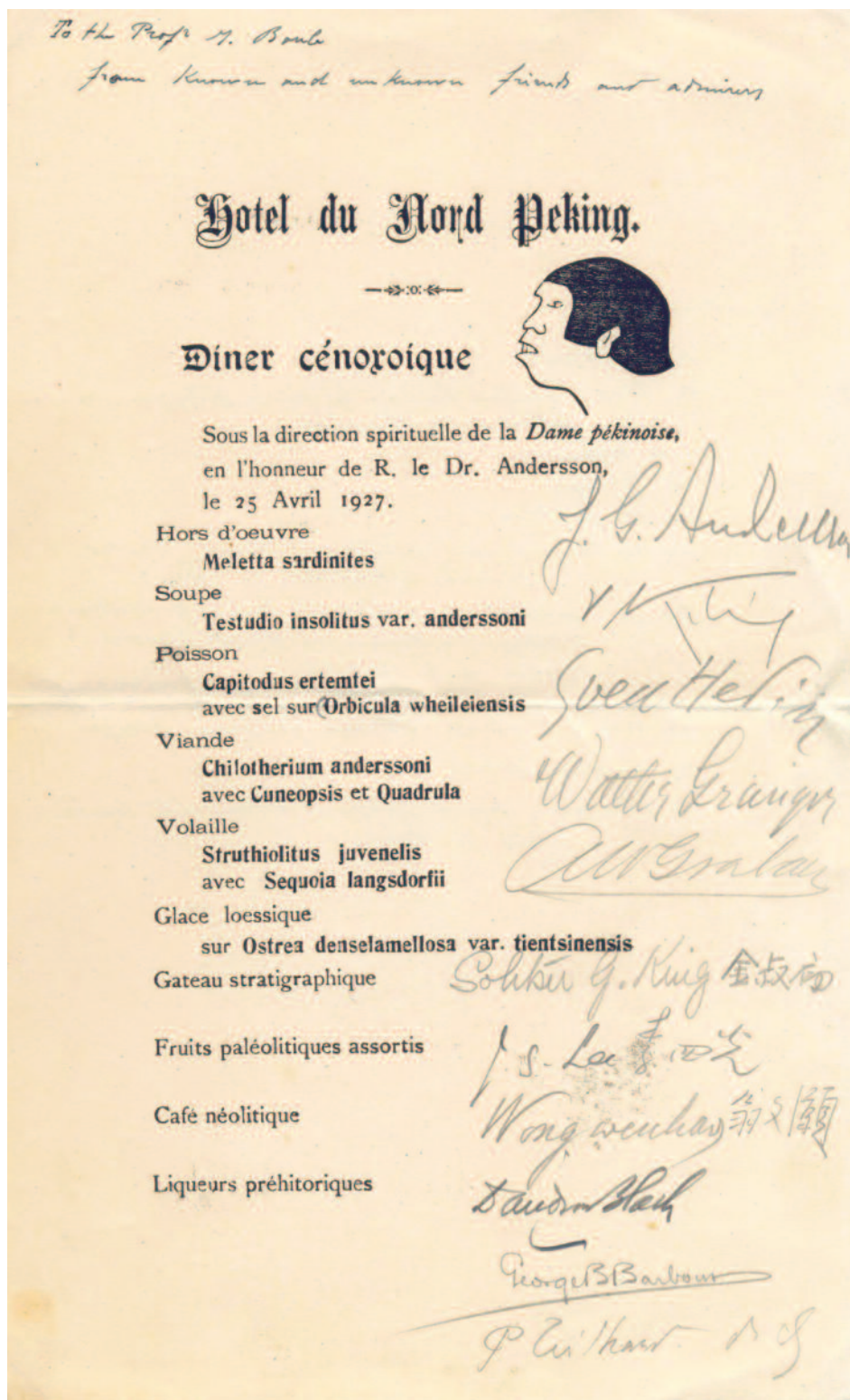
Gâteau stratigraphique

Fruits paléolithiques assort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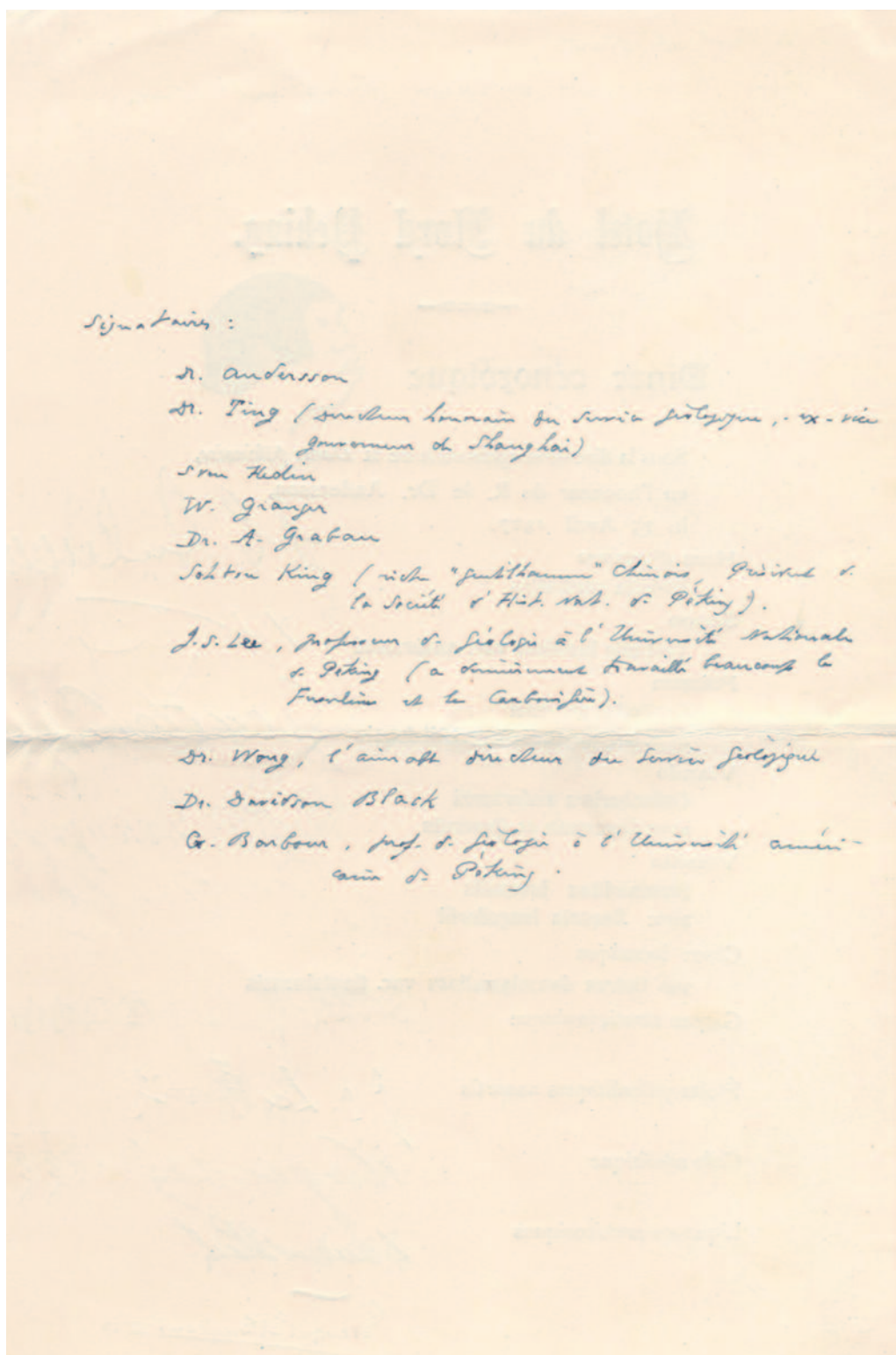
Café néolithique

Liqueurs préhistoriques

²⁹ 此餐卡在菜名部份有些為想像之作，另一部份則有確實學名存在，而且與安特生或丁文江在華北的發掘成績有關，例如：*Chilotherium anderssoni*, *Struthiolitus*, *Sequoia langsdorfii* 皆與安特生研究有關，而 *Cuneopsis*, *Quadrula* 則與丁文江在山西、河南交界處三門峽所發現的大介殼類化石有關。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4, 此書原文瑞典文版在 1932 年出版)，頁 29, 85, 135, 140, 152 之描述。此處中文為試譯。



圖一.1：餐卡正面。此文獻現藏於位在巴黎的古人類學中心（Fondation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筆者感謝該中心主任 Henry de Lumley 教授惠允使用文獻圖檔。



圖一.2 : 餐卡反面

(二) 聚會事由和時間點：

根據寄出這張餐卡的德日進向步勒所做的說明，這次聚會由丁文江作東，主客是安特生。但是德日進並沒有特別說明聚會事由。依照賈蘭坡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所提供的資料，餐會應該是為了慶祝〈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關於合作研究第三紀及第四紀堆積物協議書〉之簽署、發現北京人牙齒化石，以及歡送安特生。地點則是在北京崇文門內德國飯店。⁴⁰安特生實際上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已經告別久居的中國，回到瑞典工作。他當時一邊在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講授東亞考古學，一邊籌劃東方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⁴¹並且積極安排瑞典王太子阿道夫（Gustaf Adolf）環球旅行中在中國這一站的相關事宜。⁴²一九二六年秋，為了全程陪伴王太子在華的行程，⁴³他又來到中國，並且一直停留到一九二七年春。這段期間，他也為了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中亞考察行程奔走。事實上，在餐卡中標明的聚會日期四月二十五日之翌日，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終於簽訂協議，一波三折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得以在五月九日啓程（詳後）。

德日進在寄出這張具有紀念價值的餐卡的同時，附了一封短信，簡短地描述了這次聚會的氣氛和正在變動的一些計畫：⁴⁴

這次聚會氣氛是十分熱忱的，有些片刻甚至可說是令人感動的。善良的葛蘭階帶了點憂愁的心情，因為安德魯率領的遠征隊確定是要解散了：內蒙古已經不讓人進行地質研究，而且可能未來幾年都是如此。斯文·赫定則確定要啓

⁴⁰ 見賈蘭坡，〈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收入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56-61。賈蘭坡此回憶文主要是紀念丁文江，文中亦附有一樣的餐卡，但是同樣的這些賓客簽名次序不同，推測是每位賓客各有一份印製好的餐卡，並於餐間互相簽名留念，本文所依據的這份資料是德日進後來把他自己的那一份寄給老師，並且在背後簡要地加註賓客的身分。不過賈蘭坡提到的聚會日期是四月二十日，與餐卡上標示不同，可能是賈之誤植。

⁴¹ 東方博物館為該博物館正式的中文名稱。有關此博物館的起源與目的，可參考安特生在該館刊物第一期的說明：Johan Gunnar Andersson, "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 (1929): 11-27。根據曾任該館館長的馬思中之說法，該博物館是中國之外，有關中國史前文物的最大收藏地，見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p. 4. 此書為英、中雙語版。

⁴² 見馬思中、陳星燦，〈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 (2002): 10-17。

⁴³ 瑞典王太子該次在華行程前後持續將近一個月，由 Alex Lagrelius 和安特生全程陪伴。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是在北京，之後到山西參觀停留約十天，並親自在當地考古遺址挖掘，之後到天津，最後經上海離開中國。細節可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⁴⁴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信，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71.

程了，雖然加進了頗多中方團員，但這些看來一點也不對他造成困擾。至於以靈性姿態出席餐會的「北京淑女」，據說她就是在周口店留下兩枚牙齒的那個人。

在周口店，發掘工作已經在年輕的步林指導下展開了。……丁、翁、步達生跟我在上週二去了發掘現場，我們當場就檢到一個獼猴的下顎骨。

一九二七年是多起國際合作計畫開動的一年，卻也是中國社會因為民族主義情緒升高，而開始嚴格限制外國團體在華進行地質、考古、探險等工作的一年。

以即將展開國際合作的部份來看，當時主要有周口店發掘計畫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周口店遺址是由安特生在一九一八年輾轉發現的。經過一九二一年和二三年師丹斯基的試掘活動，所得化石大多運往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維曼教授（Carl Wiman）主持的實驗室清理和研究。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安特生在大家為王太子訪華所舉辦的慶祝會上，宣佈兩枚人齒化石的發現。這也就等於宣佈中國曾有遠古人類的可能性。葛利普並且當下為這可能存在的人取名「北京人」（Peking Man）。當時在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科擔任主任的步達生本身支持人類起源於中亞的假說，又因為與安特生熟識，已經事先知道此事，並且表現高度興趣。所以未等到此消息公佈，就在十月初開始和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協商，提議共同規劃周口店發掘計畫，以及籌建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雙方並且將想法落實在紙面上，先由步達生草擬計畫書，經過翁文灝修改，然後將計畫書交給協和醫學院院長胡恆德（Henry S. Houghton），由胡出面把提案寄給洛克斐勒基金會。³⁵兩個多月後，也就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步達生函告翁氏，表達洛克斐勒基金會同意撥款給他們所提的周口店項目 24,000 美元，同時請翁訂出一個時間，以便與胡恆德、安特生一起做進一步的具體細節規劃。二月上旬，〈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關於合作研究華北第三紀及第四紀堆積物協議書〉出爐，³⁶並獲得出資的基金會同意。又經過一個多月，雙方合作進行的周口店古人類遺骸發掘工作正式展開。³⁷由瑞典古生物學家步林擔任野外工作顧問及古生物研究專員，地質調查所的李捷擔任地質和地貌學的調查兼事務主任。此時安特生與步達生早已口頭上邀請德日進考慮加入該發掘計畫。³⁸該年夏天，張作霖與閻錫山內戰，周口

³⁵ 李學通，《翁文灝年譜》（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47。

³⁶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 28-29 提供了這個協議書的詳細內容。

³⁷ 根據李濟，〈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之經過〉，收入朱傳譽編，《李濟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開挖日期是該年四月十六日，見頁 19。

³⁸ 德日進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的信中提到安特生和步達生對他的這項提議，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5.

店附近常可聽到炮聲，甚至有零散士兵在挖掘洞穴附近試發手榴彈。到了十月，翁考慮到戰事發展，曾經從大連急電督促二人收工回城，但就在該月十六日，工作隊發掘到一個保存完好的臼齒。憑著這枚牙齒化石，再加上先前的兩枚，負責鑑定工作的步達生決定為此新發現的人種另立新屬種名，也就是中國猿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³⁹ 同年的十二月五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地質調查所會議室舉行一次特別會議，由當年的副會長葛利普主持，會中安排參與的主要人士步林、李捷、步達生報告發掘及鑑定經過。翁文灝並以「中國古人種之搜尋」，報告了地質調查所近年在古人種方面研究工作的情况。⁴⁰

步達生這個另立新屬種的鑑定，其實參考了葛利普的意見，但是一開始並未得到學界一致的認同。遠在瑞典的安特生在和德日進往來的書信中提到此事，兩人意見一致，都覺得證據過於薄弱，似乎應該要再等一等。⁴¹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裴文中等人發掘出第一個頭蓋骨（即證實了中國確有古人類存在），使得這些爭議就此落幕。一九二九年初在地質調查所組織下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是專門統籌周口店發掘相關事務的，⁴² 在此耀眼成果後，該計畫得以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持續的支持，連續不斷地進行十餘年，短期內培養相當多人才。在五十周年紀念會上，賈蘭坡便指出：「周口店的工作為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古脊椎動物學訓練了至少兩代專門人才。」⁴³

除了周口店計畫，在前述的合作案方面，另外還有斯文·赫定領隊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之籌備。⁴⁴ 赫定與部份歐洲團員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到達北京後，前後歷經了五個月的會談，才得以在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取得協議的情況下，由中歐各一半成員組團出發。在最初階段，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初，赫定

³⁹ 其鑑定報告發表在《中國古生物誌》，由李濟做中文節譯。

⁴⁰ 李學通，《翁文灝年譜》，頁52。

⁴¹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lettres inédite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et John Gunnar Andersson, 1926-1934*, ed. Pierre Leroy (Paris: Fayard, 1971), p. 47. 此書信集收有這段期間德日進寄給安特生的十二封信，以及安特生寄給德日進的七封信。

⁴² 新生代研究室之名稱其實在一九二七年就出現，但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才正式成立。一九五〇年地質調查所停止運作後，新生代研究室被劃歸中國科學院，先是在一九五三年改成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一九五七年擴大為古脊椎動物研究所，一九五九年更名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有關此研究室，可參考楊鍾健，〈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科學》1948.11：325-328；甄朔南，〈新生代研究室在中國現代科學史上的地位〉，《中國科技史料》1984.4：87-89；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頁63。

⁴³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203。

⁴⁴ 目前論及此科學考察團的文章不少，但是資料不盡可靠，以下有關此考察團組建過程之敘述，主要參考：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學考察團組建述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3：22-29；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004.2：95-105。二文皆提供了最後簽訂的協議書之內容。

原本透過外交的管道，讓考察隊的計畫取得瑞典與德國駐華外交單位的保護，並與中國外交單位協商，很快地取得同意和協助。同一期間，他也與翁文灝代表的地質調查所簽訂合作協議。⁴⁵不過他的計畫被報紙披露後，受到部份海外留學歸國的人士質疑，他們極力反對外國勢力肆意採集中國古物運往西方。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等人串連設於北京的十多個科學機構，臨時組成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⁴⁶這個協會成員認為政府太軟弱，而地質調查所簽訂的協議不夠明確，且未安排監督機構，約束力不大。他們認為中國古物應由中國人自行發掘採集，自行研究。在三月五日召開第一次大會討論後，他們即透過報紙輿論，向政府施壓，要求禁止考察隊的行動。從三月五日到四月二十六日，總共舉行九次會議，要求赫定接受納入中方人員、採集品一律留在中國等等條件。在幾番協商後，雙方互相讓步，終於在四月二十六日簽訂協議。五月九日從北京正式出發時，全團有學者二十七人，其中歐人十七人，中方十人，另外工役三十四人，雇用了將近四百頭駱駝，是個十分龐大的隊伍。

至於德日進信中提到的面臨解散或說是被迫改組的部份，主要是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所組成的中亞考察團（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這個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在蒙古等地進行調查的考察團，原本是完全由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所召集的成員組成。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甫成立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在成功地迫使赫定改變原來計畫後，也把矛頭轉向美國中亞考察團。⁴⁷一九二八年開始，這個考察團受到剛成立的官方機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監督，⁴⁸其第四次赴蒙古考察所得採集品被扣押，考察活動又被迫接受中方人員。由於雙方協調一直不順，該團終於在一九三〇年提前結束其考察行動。這也是為什麼德日進在信中說葛蘭階在聚會中顯得有些憂愁，可能是美國團隊從赫定的例子中多少看出中方未來處理相關事務的態度。

⁴⁵ 赫定於十一月二十日抵達北京，二十五日即在安特生的陪同下與翁文灝會面。見李學通，《翁文灝年譜》，頁49。

⁴⁶ 根據學術團體聯合會章程所載，參與的機構及團體包括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京師圖書館、中央觀象臺、古物陳列所、故宮博物院、中國天文學會、中國地質學會、北京圖書館、中國畫學研究會、中國圖書館協會。三月五日所召開的第一次大會為聯席會議，會議最後並決定將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變成一個永久機構。其最後正式名稱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並在五月四日前後將協會章程呈報外交、教育農商等部備案。見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頁98。

⁴⁷ 羅桂環，〈20世紀前期兩次失敗的中外合作科學考察及其原因〉，《中國科技史雜誌》26.3（2005）：193-203。

⁴⁸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是政府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基礎上設立的一個官方機構，於一九二八年成立，先是隸屬於大學院，一九二九年三月，大學院制結束後，改隸屬教育部。起初會址設於上海，北伐完成後，又設北平、江蘇、浙江等分會。後因北平賴以保存之古物較多，於一九二九年將會址遷至北平圍城，抗日戰爭爆發後，該會停止運作。有關該會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五年間處理過的相關案件，可見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其中第一項即與美國中亞考察團有關。晚近相關研究，初步可參考羅桂環，〈試論二十世紀前期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成立及意義〉，《中國科技史雜誌》27.2（2006）：137-144。

至於為何是「在北京淑女的精神引領下」？原來是一九二六年底，法國科學院院士兼常務秘書，本身也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教授的礦物學家 Alfred Lacroix 到日本參加第三屆泛太平洋科學會議（Pan-Pacific Science Congresses），⁴⁹ 由於與德日進認識，便順道到中國拜訪當地的相關機構，當地科學界人士因此為他舉行了一個歡迎晚宴。在眾人杯酒交錯間，葛利普突然當著眾人的面，對著熟識多年的安特生呼問：「北京人的研究究竟進行得如何了？那到底是個人類還是個肉食性動物？」因為實際的研究還沒有進一步具體結果，安特生說他當時被葛利普如此一問，直覺天搖地動，內心發窘。為了能夠巧妙又得體地回答這個眾人關心的問題，不讓自己跟那個可能存在的北京人沒面子，安特生靈機一動，便回答道：「親愛的葛利普先生，根據周口店研究的最新消息指出，我們的老朋友既不是個男士、也不是個肉食動物，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那是一位女士。」⁵⁰ 從此以後，北京淑女（Peking Lady）的名號就這樣流傳開來，在周口店研究的相關人士間成為趣談。安特生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從瑞典寫了一封信給在巴黎的德日進，問他對步達生發表的新屬種的看法，還提到他當時正在撰寫的書中（也就是後來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黃土的兒女》），一定會把北京淑女寫進去。⁵¹

（三）聚會人物：

這次餐會連東道主，共有十一位。既是丁文江作東，賓客名單應是丁文江所擬。倒是餐卡本身是以法文印出，而賓客中原屬於法語系國家的僅有德日進，所以餐卡很有可能是德日進設計的。以這張餐卡上簽名的順序來看，在座的有安特生、丁文江、赫定、葛蘭階、葛利普、金叔初、李四光、翁文灝、步達生、巴爾博、德日進。如前所述，現有的學科史著作中，沒有一份曾同時提供給我們此次餐宴所有參與者的基本資料，我們因此有必要於此一一介紹這些人物，以便瞭解其合作關係。下面就讓我們像攝影機 travelling 的手法，將鏡頭逐一照在餐桌上的每位人物，在有限的篇幅內，說明他與這個核心社群的關係。

⁴⁹ 此次泛太平洋科學會議，時間從該年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一日，中國方面由翁文灝帶團參加，這也是中國學者首次參加該會議，見李學通，《翁文灝年譜》，頁 48。有關 Alfred Lacroix 學術生涯及研究重點，可參考 Philippe Jaussaud, Edouard-Raoul Brygoo (ed.), *Du jardin au Muséum, en 516 biographies* (Paris: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2004), pp. 321-322。德日進在世界各地進行地質及考古研究時，遇有礦物標本，多是寄給 Lacroix 鑑定與保存。

⁵⁰ 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p. 105. 此段對話在英文版中如下：“Well, Dr. Andersson, how are things just now with the Peking man? Is it a man or a carnivore?” “My dear Dr. Graba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Chou K’ou Tien field is that our old friend is neither a man nor a carnivore but rather something half-way between the two. It is a lady.”

⁵¹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pp. 47-48.

安特生

依照餐卡上的簽名順序，第一位便是主客安特生（1874-1960）。⁵² 安特生是瑞典納克省（Närke）人，青年時期在烏普薩拉大學學習地質及古生物學。⁵³ 在參加過幾次極地探險後，他在一九〇六年成為瑞典地質調查所的所長。其後不久，在同鄉新常富（Erik T. Nyström）推薦下，⁵⁴ 他答應了中國政府農商部邀請，成為該部的礦政顧問。⁵⁵ 他從一九一四年五月到達中國，到一九二五年七月初離開，共在中國居住了十年有餘。他與丁文江結識於一九一五年，也就是丁文江結束了在中國西南數個月的地質學和人類學調查回到北京之後，從此兩人成為親近的合作夥伴。在他旅華初期，由於職位的關係，他的工作內容是專門探勘煤礦和鐵礦的蘊藏地，協助發掘中國的地下資源。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間，他在探勘礦產之餘，也展開收集化石的計畫。此時期，其工作內容逐漸從地質轉到古生物研究上。一九二〇年，他對兩年前曾發現化石的河南地區持續的關注，促成了他對該區石器方面的興趣，而在中國助手劉長山於仰韶村收集（大多數是購買而得）到大批石斧、石刀和其它類型的石器後，他的興趣轉向仰韶石器文化的研究。一九二一年十月，在獲得瑞典方面的資金以及中國官方的同意後，安特生親自前往仰韶村進行挖掘工作，歷時一月有餘，同行者有袁復禮、師丹斯基，以及幾位中國助手；而步達生也曾短期加入該項工作。⁵⁶ 自此，他的研究不僅從原先的地質探勘擴展到古生物學，並且因為此「仰韶革命」，⁵⁷ 又正式擴展到史前考古學領域。仰韶的出土物直接證實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存在，推翻了當時認為中國無石器時代的假說，⁵⁸ 引起了包括胡適、傅斯年等人的討論，⁵⁹ 亦掀起了田野考古的風氣。從一九二三年五月到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又用十八個月的時間在西北進行一次

⁵² 此處有關安特生的生平以及其中國經歷，主要參考：Bernhard Karlgren, "Johan Gunnar Andersson: In Memoria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3 (1961): IV-XV;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 87-94；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⁵³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10.

⁵⁴ 此人是最早在中國任職的瑞典地質學家，他先在山西大學任教，後來又在太原建立科學研究所。見 J. G.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p. 19。

⁵⁵ 當時瑞典在中國的科學家不少，據李濟在《安陽》一書的看法，是因為當時中國受到列強割據，而瑞典被認為是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故中國政府偏好選擇瑞典專家做顧問。見該書中文版：李濟，《安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45。

⁵⁶ 安特生在遼寧錦西縣沙鍋屯以及河南澠池縣仰韶等地所挖掘到的人骨化石皆交由步達生鑑定，步達生的報告發表成：《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收入《中國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三冊》（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1925）。

⁵⁷ 「仰韶革命」一詞引自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35。

⁵⁸ 安特生本人詳述了這段發掘的過程，以及他從仰韶陶器對中國文化來源的看法，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5 (1923): 1-68.（袁復禮節譯，《中華遠古之文化》，收入《地質彙報》〔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3〕）。

⁵⁹ 胡適在日記中曾幾次提到安特生的發現。見陳星燦、馬思中，〈胡適與安特生——兼談胡適對 20 世紀前半葉中國考古學的看法〉，《考古》2005.1：76-87。

更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目的是希望尋找中亞在新石器時代的相關遺跡，好與仰韶村出土文物進行比較，探索可能的文化擴散遺跡。此行沿途發現了五十餘處考古遺址（包括齊家坪遺址、馬家窑遺址、沙井遺址等等）。⁶⁰ 在這些重要發掘之後，安特生打算回瑞典花兩年的時間對所獲文物進行研究，並且似乎有兩年後再回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的打算，但他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離開中國回到斯德哥爾摩後，卻因後來時局的變化等等，並沒有實現再回到中國長住的計畫。

事實上，從一九一七年開始，安特生因為調查內容已經不限於原來中國政府委託他的經濟地質學方面的工作，而延伸到古生物學方面，他希望能為瑞典的博物館收集中國地區的化石，因此便開始寫信給瑞典國內相關人士，請求經費支持他在中國的科學活動。他前後得到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⁶¹ 拉各雷留斯（Axel Lagrelius）等有力人士的協助。拉各雷留斯為軍方印刷廠的負責人，早先曾經贊助過瑞典在極地的探險活動，由於安特生也參加了其中幾次探險，因此彼此早已認識。拉各雷留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成立了「中國研究委員會」（China Research Committee），目的便是為安特生在中國的古生物和考古研究進行募捐。⁶² 一九二〇年，瑞典國會投票表決，決定支持安特生的研究活動，撥出金額高達九萬瑞典克朗的經費。⁶³ 自此以後，安特生即使在領不到薪水⁶⁴ 或自願捐出薪水的清況下，⁶⁵ 都仍然可以進行田野考古調查活動。也是因為安特生所發掘的出土文物都是在瑞典資助的情況下所得，中方遂答應讓安特生將出土文物寄往瑞典，在記錄研究後，再將其中一半標本寄還給中國。中國研究委員會前後資助了五十萬瑞典克朗給安特生，包括他的發掘相關費用以及寄送標本的費用，並在文物寄達瑞典後，於一九二六年決定成立一所東方博物館，專門保管、整理和展示這些文物。安特生被任命為第一任館長，擔任此職直到一九三九年退休為止。該博物館歷經三年的準備期，直到一九二九年才正式對外開放。在此期間，安特生為了瑞典王太子在環球旅行的訪華一站，曾在一九二六年秋回到中國。而本文

⁶⁰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35, 57, 61. 有關安特生在中國北方主要的考古活動，可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頁 94 的一覽表。

⁶¹ 有關蒙德留斯對安特生在中國考古活動的支持，可見陳星燦、馬思中，〈蒙德留斯與中國考古學〉，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1 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686-695。

⁶² 有關此委員會之起源，安特生曾在其十周年時做過詳細回顧，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⁶³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35.

⁶⁴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國官方因政局不穩、匯率波動等等，安特生的薪水停發。見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55. 此時期連全國大學的教師薪資也延緩撥發，使得教師組團抗議，包括李四光等人都參加了索薪團，見于建坤，《李四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58。

⁶⁵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 59. 一九二四年，地質調查所將安特生到期的聘書又延長三年。但安特生決定將三年薪資全數捐出作為《中國古生物誌》的出版經費。

所討論的聚會，便是在他此次訪華行程結束前，他在中國的老朋友爲他舉行的踐行餐會。一直到丁文江在一九三六年初意外過世前，安特生與丁文江之間斷斷續續地保持書信往來，持續對仰韶文化等等的討論。⁶⁶而安特生回瑞典後，也將其在中國的經歷和發現寫成了幾部通俗作品。其中第一部爲《龍與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⁶⁷他把該書題獻給丁文江與拉各雷留斯，兩位對他在中國的科學活動協助最多的人。另外，他最有名的書應該是一九三二年寫成的《黃土的兒女》，此書英文版在一九三四年出版前夕，步達生因心臟病過世，安特生便把英文版獻給步達生。爲了此書，他在與德日進的通信中，曾經幾次向德日進索取他和桑志華在田野的相片，以及法國方面最新的研究報告。

丁文江

至於此次餐會的東道主丁文江（1887-1936），他是胡適眼中「歐化與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⁶⁸傅斯年也說他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⁶⁹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丁文江，少年時期在私塾老師以及當時泰興知縣龍璋（研仙）鼓勵下，於一九〇二年十五歲赴日留學、兩年後轉往英國，曾考入劍橋大學，但因經濟因素轉往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就讀，在一九一一年取得動物學與地質學學士學位返回中國。回國後先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⁷⁰一九一三年開始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任職，並與章鴻釗（1877-1951）一起組建地質調查所以及地質研究所，被視爲是地質調查所的靈魂人物。在中國地質學的建制方面，不管是地質調查所、北京大學地質系⁷¹、中國地質學會⁷²，他都起了奠基性的

⁶⁶ Fiskesjö, Magnus &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pp. 69-70.

⁶⁷ 此書瑞典版出版於一九二六年，英文版於一九二八年，目前尚無中文版。

⁶⁸ 楊翠華、龐桂芬編，《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晚年身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171。

⁶⁹ 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頁1。

⁷⁰ 上海南洋公學爲盛宣懷在一八九六年創立，與北洋大學堂同爲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大學。由於位處於上海租界，較少受戰火侵擾，孕育出中國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南洋公學在一九一〇年代後期改名爲南洋大學，後又改爲上海工業專門學堂，至一九二一年與多校合併，統稱交通大學。見盛懿、孫萍、歐七芹編，《三個世紀的跨越：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⁷¹ 北京大學地質系是當時中國各大學中最早設有地質系的學校，其前身京師大學堂在一九〇九年設有地質學門，一九一二年改成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首屆學生畢業後即停止招生。一九一三年開始由農商部地質研究所負起培育人才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北大恢復地質系後，地質研究所就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停止招生，將教學工作回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之後有東南大學（一九二八年改爲中央大學）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地學系。一九二三年清華學堂也開設地理系，陸續將地理、地質、氣象諸科納入課程。見劉瑞珣、于洗、楊光榮，《我國高等地質教育發展沿革概述》，收入前引書，《地質學史論叢·4》，頁195-199。

⁷² 中國地質學會成立於一九二二年，有二十六位創會會員。其中外籍創會會員有三人，除了本文提到的葛利普和安特生，還有一位是美籍的麥美德（Miss Luelle Miner）。她是北京協和女書院院長，曾經以中文編著出版《地質學》一書，於一九一一年出版，據說是中文寫成的地質學最早的教科書之一。此條資料見夏湘蓉、王根元，《中國地質學會史（1922-1981）》（北京：地質出版社，1982），頁3。

作用。他特別瞭解當時中國科學人才缺乏，而應該善用客卿的道理。他自己先是在一九一三年與梭爾格（F. Solger）一起到山西進行野外考察，一九一六年後與安特生頻繁交流、一九二〇年又聘請葛利普到北大任教等等。他也促成許多合作案的進行，例如洛克斐勒支持周口店發掘計畫一案，先經過兩年的工作，有了初步成績後，便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正式在地質調查所組織下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來長期規劃和執行這個計畫。該研究室就是由丁文江擔任名譽主持人，步達生擔任名譽主任，並聘請德日進為顧問。

不過他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及政治責任感，並未固守純粹學術研究的崗位，曾先後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六年接受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以及上海淞滬總辦的職位。⁷³ 本文所分析的餐會舉辦的三個多月前，他已經辭去上海淞滬總辦一職，打算重拾學術研究工作，並且開始進行《徐霞客遊記》的整理和研究。⁷⁴

斯文·赫定

至於斯文·赫定（1865-1952），他出生於斯德哥爾摩，從小就立志做探險家。⁷⁵ 十九世紀末，世人對中亞地理還瞭解不多的情況下，他就已經在該區域進行過三次探險活動（分別是一八九三到一八九七年、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八年）。他在柏林大學就讀期間，曾經受業於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第一次中亞探險活動之前，還曾經特別到德國再請教李希霍芬。⁷⁶ 他以探險活動為基礎所寫成的遊記，陸續被譯成多國語言，在歐洲頗為暢銷。⁷⁷ 在事隔十八年後，一九二六年，他又在德國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贊助下，帶領一個由德、瑞、丹麥多國人士組成的探險隊，打算針對中國西北地區做深入的考察，並且為該航空公司調查建立從上海到柏林航線的可能性。此時赫定其實已經超過六十歲，是個經驗豐富的探險家。不過這第四次中亞考察的計畫，如我們上面提過的，在與中方的交涉上，沒有他想像的那麼順利。所幸最後成行的隊伍，包括地質學家、考古學家、體質人類

⁷³ 何漢威，〈一九二六年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2010）：37-150。

⁷⁴ 王仰之，《丁文江年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頁38-44。

⁷⁵ 有關其生平，可參考邢玉林、林世田，《探險家斯文·赫定》（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⁷⁶ 邢玉林、林世田，《探險家斯文·赫定》，頁351。李希霍芬曾在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二年間在中國各地進行地理考察，後將其研究結果出版，在歐人對中國地理瞭解方面有所影響。一九三三年，李希霍芬百年誕辰時，《中國地質學會誌》曾出紀念文章，收有翁文灝及赫定之英文文章。

⁷⁷ 現也有許多中文譯本，其中較著名的可能是根據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英文版 *My Life as an Explorer* 所翻譯的《我的探險生涯》（臺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學家、氣象學家等等，前後共歷經六年（1927-1933），⁷⁸一般認為這是中亞科學考察史上規模最大、收穫最豐的一次現代科學考察。在經費全由外國負擔的情況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無法堅持採集品全數留在中國的主張，只能答應赫定讓副件運往瑞典整理研究，於一定年限後再寄還中國。最後屬於瑞典保管的部份，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共有五十六卷的研究報告出版，⁷⁹而屬於中方保管的部份，卻因後來時局動盪、戰爭遷徙、人力不足等等因素，多有遺失。⁸⁰

葛蘭階

在赫定之後簽名的是葛蘭階（1872-1941），他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⁸¹由於自小對於自然生物觀察和採集的興趣，在一八九〇年、高中尚未畢業前，即進入紐約自然史博物館工作。先在專門製作動物標本的部門工作，後來確定自己的興趣在古生物上，便轉到古脊椎動物部門。在還未到中國之前，他已經在美國西部、埃及等地從事過哺乳動物化石發掘，與另一名美國中亞考察團成員梅托（William Diller Matthew）有多次合作經驗。作為一個田野古生物專家，他被認為不僅擅於辨認可能的化石遺址，並且對於發掘經過筆記完整，擅於分析不同遺址之間的相連關係。所以他在美國中亞考察團中是以副領隊的身份參加，而領隊安德魯負責的主要是團隊的行政工作，對於科學工作較少參與。一九二二年，美國中亞考察團在蒙古地區第一次進行田野發掘，他則是團隊內唯一的古生物專家。一九二一年夏秋之交，他為了籌備美國團隊到中國考察之事來到北京。此時正好是安特生安排師丹斯基在已經發現的地點雞骨山試

⁷⁸ 依照當時協議的內容，該考察團其實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就結束了野外工作，不過從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赫定又在中國政府的資助下，組織一個汽車考察團，是為綏新公路勘察團。由於兩段期間的工作在人員與考察內容上有些重疊，故也有考察八年之說。例如赫定自己的相關著作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即採八年之說。此書有中譯本：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譯，《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⁷⁹ 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八二年，共出版了五十四卷，這五十四卷的目錄，可見邢玉林、林世田，《探險家斯文·赫定》，頁409-413。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又陸續出版了兩卷，現在共是五十六卷，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經過〉，《中國科技史雜誌》27.3（2006）：238-246。

⁸⁰ 在中方保管的出土資料中，當時發掘出的一萬多枚簡牘，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居延漢簡，後來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與研究。相關細節可見：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21-952，收入邢義田，《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89-424；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⁸¹ 有關於葛蘭階（當時亦有譯成谷蘭階）的生平，本文主要參考以下二文：Edwin Harris Colbert, "Granger, Walter Willis," in *Encyclopedia of Paleontology*, edited by Ronald Singer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p. 535-536; Vincent Lenard Morgan & Spencer G. Lucas, "Walter Granger, 1872-1941, Paleontologist," *New Mexic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19 (2002): 1-58. 但此二文中關於他在中國部份的資料不多，所以必須參考以下著作中的零星描述：Roy Chapman Andrews & Henry Fairfield Osborn,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A Narrative of the Field Work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Ronald Rainger, *An Agenda for Antiquity: Henry Fairfield Osborn and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890-1935* (Tuscaloosa,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掘的時候，他答應安特生教他和師丹斯基一些田野發掘技術。兩人到現場探望師丹斯基的挖掘工作時，就在當地村民的引導下，發現距離該地點不遠的北京猿人洞，⁸²也就是後來真正找到北京猿人遺骸的地方。安特生在中國期間，有關古生物方面的化石，大多請葛蘭階幫忙鑑定。⁸³德日進與他熟識後，也曾幾次寫信給他討論一些動物化石歸類的問題。⁸⁴

葛利普

在葛蘭階之後簽名的是葛利普（1870-1946）⁸⁵。葛利普是德裔猶太美人，於一九〇〇年獲得哈佛大學地質博士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第一次大戰後，因其德裔身份，又曾經公開讚揚德國科學之先進，而受到排擠。此時，丁文江正面臨北大地質系學生程度低落、國內師資短缺的情況，而希望延聘外國地質與古生物專家來華從事研究與培育人才的工作。在美國地質調查所的懷特（David White）推薦下，丁文江遂邀請葛利普到中國工作。⁸⁶他到中國前已有上百種或長或短的論著，是一位受到肯定的古生物學家，⁸⁷一九二〇年來華後，一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於北京，總共在中國住了二十六年。他先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培育了好幾屆學生。另外，爲了開展古生物學的研究，地質調查所利用開灤、北票等煤礦公司捐助的資金，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了古生物學研究室，由葛利普擔任主任。但其專長爲無脊椎動物化石，故其訓練人員也多以此爲專長。至於古生物學裏的脊椎動物化石研究項目，則要到新生代研究室成立，由德日進、楊鍾健等人專門研究。葛利普個人研究以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爲主，他擅長於綜合性理論，在晚年提出脈動學說。他認爲全球的海進與海退形成一個脈動紀，而此現象在地層記錄上形成一個脈動系，地層沈積相的演變、生物群的演化均與此脈動有關。⁸⁸葛利普在地質調查所除了做研究之外，還推動期刊出版、學會組成等

⁸² 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pp. 97-98.

⁸³ 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3* (1923): 1-152 之前言。

⁸⁴ Georgetown university 圖書館藏有十七封德日進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六年間寫給葛蘭階的信，但沒有葛蘭階回信的部份。見 The Granger-Teilhard de Chardin Collection，網址：
<http://library.georgetown.edu/dept/speccoll/granger.htm>（搜尋日期：2008.03.18）。該網站雖未提供信件全文，但有每封信的摘要說明，讓讀者可略知信件內容。

⁸⁵ 有關葛利普生平及著作，本文主要參考《中國地質學會誌》在一九三一年葛利普六十歲時所推出的專號，以及《地質彙報》在一九四七年（葛利普過世的次年）爲他所做的專號中匯集的文章，再加上以下二文：潘云唐，〈葛利普——中國地質科學工作者的良師益友〉，《中國科技史料》1982.3：22-30，頁52；楊靜一，〈葛利普傳略〉，《自然科學史研究》3.1（1984）：83-89。

⁸⁶ 見潘云唐，〈葛利普——中國地質科學工作者的良師益友〉，頁27。

⁸⁷ 例如他在一九一〇年出版的《北美標準化石》，是該領域標準參考書之一。

⁸⁸ 見 William King Gregory, "Minute on the Life and Scientific Labors of Amadeus William Grabau,"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7.11 (1947): 31-34。

等事務。他和安特生幫助丁文江規劃《中國古生物誌》，還負責籌錢、捐錢，使該刊物得以順利出版。而這也是當年地質調查所的刊物中唯一存續至今的一本刊物。一九三七年後，調查所許多人員南遷，葛利普因行動不便，仍然留在北京。一九四六年因胃疾過世，遺囑中將全部個人藏書資料捐給他參與創辦的中國地質學會，骨灰則葬在北大地質館前。

金叔初

在葛利普之後簽名的則是金叔初（名紹基，以字行，1886-1949），也是此次餐會中，以嚴格定義而言不能算是地質、考古界的工作者。德日進在給親友的信中稱他為「紳士博物學家」（gentilhomme naturaliste）。⁸⁹ 金叔初是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人，其祖父金桐（1820-1887）曾在上海擔任過「絲通事」，會說洋涇濱英語，自十九世紀中期即有與西人及西洋事物接觸的機會。⁹⁰ 金家當時為南潯富戶中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黃狗」的八牛之一，到了金桐之子金燾（字星垣，別號沁園）的時候，更因事業經營成功，被稱為「小金山」。金紹基在家排行老三，十六歲即在父親的安排下，隨兩個兄長金紹城（1878-1926）、金紹堂（1880-1965）赴英留學，在倫敦 King's College 修習電氣學、化學，一九〇六年回國後陸續在公私立各機關服務，也曾在數個學校任教。⁹¹ 因中外貿易事業獲利頗豐，加上家族原有資產，愛好介殼類研究的金叔初曾贊助當時多項科學與文化事業，本身也是多個學會的會員。例如在中國地質學會，他是永久會員；還有創立於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北京博物學會（Peking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他是贊助最多的創始會員，⁹² 後亦擔任過會長。⁹³ 一九三〇年，在丁文江的鼓吹之下，他捐了三萬銀元給地質調查所，在此機構組織下成立燃料研究室，並取

⁸⁹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ed. Claude Aragonnè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56), p. 103.

⁹⁰ 見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1-9。金開英為金叔初二哥金紹堂的長子，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修習化工，後回國協助沁園燃料室事務。一九三五年中國石油公司成立，他供職協理，之後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於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一年任該公司總經理。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中談到金叔初的部份雖不多，但談其家族產業的部份頗多細節，讀者可藉此瞭解其家族產業之規模。

⁹¹ 見邱敏芳，《領略古法生新奇——金城繪畫藝術研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頁19-21。金城即金紹城。

⁹² 此學會由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地質系、燕京大學生物系、輔仁大學生物系等愛好自然科學的中外人士組成，萬卓志（George Wilder）為首任會長，翁文灝、金叔初為副會長，祁天錫（Gist Gee）為秘書兼財務。有關學會成立初期大致情形，可見 William J. Haas, *China Voyager: Gist Gee's Life in Science*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pp. 179-182。感謝審查人提及此條書目，讓筆者注意到一些相關資料。由於此學會主要語言為英語等西語，故中文名稱翻譯時有變動，亦有稱「北平博物學協會」者。學會從一九二六年開始亦出版一英文季刊，初名為 *The Bulletin of the Peking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一九三〇年後改為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並與燕京大學生物學系報告合併發行。

⁹³ 他也曾任北平美術學院副院長，見蕭彩華，〈金勤伯〉，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pedia.cca.gov.tw>（搜尋日期：2008.01.12）。金勤伯（1910-1998），知名畫家，為金叔初長子，本名開業。

名沁園，以紀念其父，並且寫信要求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唸書的姪子金開英回國協助該研究室之工作。另外，金叔初自一九三〇年開始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方董事，歷經十年有餘。⁹⁴ 他與中國科學社似乎也有往來。⁹⁵ 由於中國科學社圖書館建館初期，皆是依賴社員與社友捐贈中外書籍，據說其中以金叔初捐贈的貝殼學圖書雜誌最為珍貴，有二千餘冊，凡英、德、法、比、日各國之貝類學雜誌，均有收藏，其完備程度被譽為「東亞所僅見」。⁹⁶ 他並且曾和中國科學社主要成員秉志（1886-1965）合寫一部《香港的腹足類》。由於金紹基是貝類標本收藏家和鑑定高手，有一回葛利普到北戴河海濱度暑假，收集了許多貝殼標本，回北京後便和金叔初以英文合寫了《北戴河的貝殼》（*Shells of Peitaiho*）一書，在一九二八年出版。⁹⁷ 另外在美國中亞考察團遭到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扣押的採集中，有關無脊椎動物部份有第四紀貝殼一百九十件，近代貝殼十件，被要求留在中國，並送交地質調查所研究，翁文灝便請金叔初負責研究。⁹⁸

李四光

至於李四光（1889-1971），本名李仲揆，其祖父原為蒙古族人，十九世紀中葉遷移到湖北黃崗附近定居。⁹⁹ 李四光早年因成績優異，被派到日本留學，學習造船機械。留日期間參加了孫中山在東京建立的同盟會組織，為首批會員中年齡最小者，僅十六歲。¹⁰⁰ 他並且在辛亥革命後，回國參加在湖北的建設工作，任湖北省實業司長，當時年僅二十三歲。後因對時局失望，便決定轉赴英國深造，改修地質學。¹⁰¹ 他在一九一三年進入英國伯明翰大學，一九一八年獲得碩士學位，經丁文江延攬，一九二〇

- ⁹⁴ 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33。
- ⁹⁵ 目前無資料顯示金叔初是否為中國科學社社員。晚近一本以中國科學社為主題的著作中，完全沒有提到金叔初，見張劍，《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 ⁹⁶ 見朱慶祚主編，《上海圖書事業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89-91。
- ⁹⁷ 潘云唐，〈葛利普〉，頁27。根據丁文江為葛利普所做的著作選目序言中所言，葛利普來華工作十年間僅一次短期外出度假，就是這次的北戴河之旅，結果他還以此書為度假的副產品。見楊鍾健，〈紀念葛利普教授六三誕辰〉，收入楊健，《自然論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184。
- ⁹⁸ 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頁17。
- ⁹⁹ 有關李四光之生平，目前有數本傳記，其中資料較詳盡者似為：陳群等著，《李四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¹⁰⁰ 張以誠，〈李仲揆的表情——記袁復禮教授回憶李四光同志的一次談話〉，收入湖北省李四光研究會、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力學專業委員會編，《李四光學術研究文集（一）》（北京：地質出版社，1984），頁74-84。因李四光和孫中山的交情，一九二五年孫中山葬禮時，他是扶棺者之一，見該文頁81。此出版品雖名為學術研究文集，但其實是湖北省李四光研究會於一九八二年座談會的成果，會中主要討論「如何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進一步積極地開展工作和活動，使李四光學術思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頁128）。文集中收有許多是後輩的回憶，多帶有聖徒列傳（hagiography）的色彩。
- ¹⁰¹ 張祖還，〈李四光教授二三事〉，收入前引書，《李四光學術研究文集（一）》，頁85。

年回國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與葛利普一起教育了中國早期幾代地質人才，也因此被認為是繼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之後，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開創者之一。他當時在丁文江的推薦和蔡元培的賞識下，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例如一九二八年，蔡元培規劃的中央研究院成立後，他便出任地質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其專長主要在地質力學方面，但也曾經研究微體古生物，以蠕科化石研究有名，對於該類化石建立了較完整的鑑定方法和分類標準。此外，他還致力於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但是對於此時期中國究竟有無冰川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中外學者的共識。尤其是當時被公認為這方面的專家如巴爾博、德日進等人在現場勘查過，都不敢貿然認同李氏見解，所以一直到戰爭爆發前都未有定見。這點在一九五〇年代後，卻被詮釋為帝國主義現象。¹⁰²事實上，一九五〇年代，章鴻釗、丁文江皆已過世，而翁文灝因先前政治立場一度搖擺而不被重用，李四光成了中共倚重的地質界領導學者，一度被稱為「中國地質學之父」。一九五〇年八月，當時政府通過成立中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地質工作，李四光便擔任主任委員。後來全國地質機構經歷解散重組，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地質部專統其事，李四光便是該部第一任部長。¹⁰³他過世後，還有一部以他為名的傳記電影被推出，彰顯「李四光同志的光輝形象」。¹⁰⁴

翁文灝

李四光之後簽名者為當時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1889-1971）。¹⁰⁵翁文灝，丁文江眼中少有的「聖人」，¹⁰⁶出身於浙江寧波的紳商家庭，中學就讀於法國耶穌會在上海興辦的震旦學院。¹⁰⁷一九〇八年赴歐，一九一二年自比利時魯汶大學取得地質學博士，據稱是第一位習地質學而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翁氏回國後其實家道已經中落，但是他仍婉拒煤礦公司工程師的聘書，決意以教書與研究為業。他進入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任職後，一九二一年，因為丁文江接受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一職，翁

¹⁰² 關於廬山冰川與當時眾多學者實地勘查意見的細節，可斟酌參考李鄂榮，〈地質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收入前引書，《李四光學術研究文集（一）》，頁114-118。此事在一九五〇年後的中國被評論成是帝國主義學者的傲慢，例如于建坤，《李四光》（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32-141便是採取這種角度。此傳記乃以小說形式呈現，敘述中所用資料皆未標明出處，其中不乏資料錯誤之處，例如廬山一行，作者把安特生、葛利普也寫入，但此二人其實並未參與此次實地勘查之行。

¹⁰³ 陳夢熊，〈50年代初全國地質機構的一次大調整、大變動〉，頁171-172。

¹⁰⁴ 張祖還，〈李四光教授二三事〉，頁85。

¹⁰⁵ 目前有關翁文灝的生平事蹟，較可靠的資料應該是：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李學通，《翁文灝年譜》（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¹⁰⁶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一個朋友病榻前的感想〉，《獨立評論》1934.4，頁5。

¹⁰⁷ 震旦學院成立於一九〇三年，是由當時在南洋公學任教的蔡元培等人提議，商請馬相伯出資，偕同徐家匯的耶穌會辦理。翁文灝則是在一九〇六年，因為科舉考試制度廢止，進入該校就讀。見李學通，《翁文灝年譜》，頁6。

文灝就開始代理所長的職務，並且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成為正式所長，一直到抗戰初期為止。¹⁰⁸ 翁文灝任內促成許多成果，包括繪製地質圖、調查礦產、調查地震等等。他本身也提出了不少研究，其中較著名的是燕山運動學說。若不談他後來被蔣介石重用，又因為蔣介石對他有救命之恩，所以推辭不去而先後擔任的政府行政職務，僅在地質學術工作方面而言，他除了擔任地質調查所的要務之外，也是中國地質學會創立的推手之一，同時在代理清華校長期間，積極充實該校地學系的課程。他對於中國地質學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也十分注重：一九二二年，中國地質學會初創立的一年，同年第十三屆國際地質學大會（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es）在布魯塞爾舉辦，¹⁰⁹ 翁氏便代表中國地質學會出席，是為中國第一次有地質學專家參加該會議，也讓國際人士知道中國已經有地質學的專門機構和專門人才。也是在這個場合，德日進與他初次相會，留下了好印象。¹¹⁰ 儘管翁文灝在其任內促成了一些中外合作案，包括周口店發掘計畫，但他總是認為，中國自己的材料還是應該自己研究，例如一九二五年，他在南開大學科學館開幕式上的演講就表示：「我們自己的材料，自己的問題，不快樂的自己研究，以貢獻於世界，卻要『勞動』他們外國人來代我們研究，我們應該感覺十分的慚愧，應該自加十二分的策勵。」¹¹¹ 這相當程度反映了當時大部份中國科學工作者面對西方傳入之科學的矛盾心態。

步達生

在翁文灝之後簽名的正是不久前才與他簽訂協議的步達生（1884-1934）。步達生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在來到中國以前，他在加拿大接受了醫學和比較解剖學的訓練，並且也在荷蘭、英國等地工作過。由於他對人類演化問題的興趣，讓他在一九一九年樂意地接受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聘用，因為他當時認為人類起源很可能是在中亞，他有意藉此在中國工作的便利，前往中亞考察。¹¹² 步達生到達中國後不久，即與

¹⁰⁸ 一九三七年底，黃汲清正式接替翁文灝，成為地質調查所所長。之後由尹贊勳（代理所長）、李春昱接任，直到一九五〇年該機構結束為止，但其中許多事務仍由翁文灝決定，見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頁63-69。當時北大地質系畢業的學生，或在地質調查所工作的幾位青年才俊也曾間斷性地參與了史語所主持的殷墟發掘，例如裴文中、李春昱、王慶昌、張蔚然等人。其身影可見於李永迪、馮忠美編，《殷墟發掘照片選輯 1928-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筆者於此要特別感謝史語所丁瑞茂先生提醒後面這份資料。

¹⁰⁹ 國際地質學大會在一八七五年由美加等地的地質學者鼓吹而開始籌劃，一八七八年，趁著萬國博覽會在巴黎舉行之便，由法國地質學會籌辦第一次大會，正式宣佈成立。最初是每三年擇地召開一次，後來改為每四年一次。這第十三次大會乃是第一次大戰後的第一次聚會。

¹¹⁰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50.

¹¹¹ 見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頁47。

¹¹² 有關步達生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情況，可參考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中的部份描述。

安特生有良好合作關係。一九二五年夏天，兩人還積極籌劃一項以新疆為目標的中亞考察計畫，並且在一九二六年取得瑞典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同意支持。在一九二六年秋，安特生宣佈當年在周口店挖掘到的化石中有兩枚牙齒化石應該是人類的牙齒後，步達生決定先以周口店發掘為重點，而把原來的計畫延後。所以他向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提議，由他自己出面向洛克斐勒基金會申請經費補助，當作是原來已通過計畫的一個追加項目，雙方在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的架構下，進一步擴大對周口店的發掘工作。步達生並且計畫成立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作為長期執行這個計畫的單位，不過後來在各方商議後，這個籌備中的研究機構改名為新生代研究室，納入地質調查所的正式組織內。¹¹⁶ 就像前面提過的，中國猿人北京種的學名，是在步達生的鑑定報告中確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正式成立後，步達生作為實際的主持人，對這個研究室抱有很大的期望。除了負責周口店發掘之外，步達生還規畫了考察中國各地新生代地質的行程。另外，在爪哇猿人、北京猿人、香港巨人牙齒陸續發現後，他也認為東南亞可能是發現遠古人類化石最有希望的地區，所以他在一九三〇年代也開始積極和印度、緬甸、法屬印度支那，以及荷屬東印度地區的學者聯繫，企圖未來以新生代研究室為根據地，將觸角伸入其它國家，做亞洲大範圍的新生代地質比較研究。¹¹⁷ 他這個想法也曾經與德日進、巴爾博、安特生等人商討。¹¹⁸ 然而一九三四年三月，步達生因為過勞，心臟病突發，死於協和醫學院的研究室，這些計畫也轉眼成空。他的過世，一度讓新生代研究室和周口店計畫的存續問題蒙上陰影。與他合作關係密切的德日進在給法國友人的信中寫到，步達生過世讓他失去了一個更甚於兄弟的人。¹¹⁹

巴爾博

接著步達生之後留下大名的是巴爾博（1890-1977）。¹²⁰ 他是原籍蘇格蘭的地質學家，一九二一年初接受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來到北京，並在成立不久的燕京大學教授地質學。在旅華初期，他曾經陪伴葛利普到野外做地質考察，而那也是葛利普平生最後的幾次田野經驗，之後他因為腿疾惡化，一九二三年後

¹¹⁶ 見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 21-22。

¹¹⁷ 楊鍾健，〈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頁 328。

¹¹⁸ George B. Barbour,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 p. 64-65.

¹¹⁹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p. 72.

¹²⁰ 有關巴爾博的生平，本文主要參考：Gérard-Henry Baudry, *Dictionnaire des correspondants de Teilhard de Chardin* (Lille: Gérard-Henry Baudry, 1974), pp. 18-21; George B. Barbour,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 p. 11; Hugh S. Barbour, 〈巴爾博 George Brown Barbour〉，收入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大學人物誌·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42-145。

便無法再遠行了。由於老師博契（Charles P. Berkey）之請託，巴爾博曾經協助美國中亞考察團的部份鑑定工作，另外也曾與德日進和桑志華一起到野外進行發掘，¹¹⁸其足跡遍佈山東、察哈爾、順化、泥河灣、桑乾河等地。他從一九二四年八月與德日進一起在田野工作後，兩人成爲終身的好友。一九二七年中到一九二九年，他短暫回美，一方面爲老師代課，一方面完成博士論文。在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他又回到中國，與德日進等人一起進行多次田野調查。由於兒子的健康問題，他於一九三二年初到一九三四年春又回美國任教。一九三四年三月，受步達生之邀，洛克斐勒基金會給他訪問地文學家（visiting physiographer）的頭銜，讓他參與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與德日進一起，伴隨著楊鍾健與卞美年，將中國各地地質與地形勘查結果整合起來。當時他已被公認爲華北地形學（geomorphology）方面的「巨擘」。¹¹⁹而他有關中國的著作也大多屬於這個領域。在這次旅華期間，巴爾博與德日進有多次一起田野考察及地質旅行的經歷，原本的友誼因此更爲深厚。先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兩人與瑞典學者那林（Erik Norin）、李四光、楊鍾健等一行到廬山實地瞭解李四光所說的冰川現象，因爲證據不足，李四光並未能說服同行。一九三五年，兩人又與楊鍾健進行長江流域從南京至成都的考察。其中目的之一，也是要瞭解長江流域同一時期是否有與華北相同的地質現象。一九三七年，巴爾博終於赴美長期任教。在中國以外，巴爾博和德日進也曾經一起在美國與非洲進行過地質旅行。德日進於一九五五年去世後，巴爾博將兩人的書信往來以及在田野工作的情況寫成小書《德日進在田野》，一九六五年出版。¹²⁰

德日進

名單上最後一位簽名的是德日進（1881-1955）。¹²¹出生於法國中央高地附近，十八歲即成爲法國耶穌會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在位於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受業於步勒，進行古生物方面的研究。一九二二年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因嚮往到歐洲以外地區進行實際的田野發掘，在步勒的安排下，以法國古生物考察團名義，來到中國協助另一位耶穌會士桑志華的田野發掘和古生物化石研究工作。¹²²一九二三年五

¹¹⁸ 三人合作結果曾寫成一文發表：George B. Barbour, Emile Licen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5.3-4 (1926): 263-278.

¹¹⁹ 黃汲清，〈論古生物學與地質學之連繫〉，《科學》30.4（1948）：98-102，頁101。

¹²⁰ 亦即前引書 George B. Barbour,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

¹²¹ 有關德日進的生平，可參考目前算是較完整的一本傳記 Claude Cuéno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s grandes étapes de son évolution* (Paris: Plon, 1958).

¹²² 細節請見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

月，初次到達中國時，德日進原本只是帶著短期在中國田野工作的想法，沒想到卻陸續在中國待到一九四六年春才返回法國。期間最大的轉捩點便是在一九二七年。當時他本身因為先前的著作受到教會質疑，被迫放棄在巴黎天主教學院的教職，暫時遠離法國。同時又因為桑志華希望他繼續協助整理化石的工作，他因此決定多停留在中國幾年。此時，周口店發掘計畫在步達生和翁文灝的合力推動下展開，出土古生物化石日多，步達生等人邀請德日進協助鑑定和研究，德日進本人也被豐富的材料所吸引，最後決定長期留在中國，因此接受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顧問一職。他從此以亞洲史前考古為工作重心，除了華北、蒙古、戈壁一代，他也曾經到長江流域、中國西南，並且到過印度、印尼、緬甸等地做過田野考古。一九五一年轉往美國定居，並且在歐洲同行的鼓吹下，積極協助開展南非考古的工作。

(四) 綜合分析：

其實，在未能參考這張紀念餐卡所提供的訊息之前，我們已經在德日進給其親友的書信中讀到有關平日聚會的文字描述。¹²³除了這類有特殊事由的聚會，他們最常聚會的地點是在葛利普的寓所：北京西城區豆芽菜胡同五號。葛利普由於腿疾而不良於行，頗喜在週末假日邀約同好，據楊鍾健的說法，其中「有他的上司，有他的學生，有他的同事，有他的同行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也有雖不同行，而同為科學工作者的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等。……這裏沒有階級，沒有主屬，甚至沒有老幼。」¹²⁴據說其住所經常是「席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不僅丁文江、翁文灝是常客，似乎連胡適偶爾也出現。¹²⁵而德日進、赫定等人只要人在北京，也會經常參加聚會。有一段時間，在葛利普家中的聚會似乎成了某種儀式，每令曾經參與者懷念。例如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中國的德日進給遠在瑞典的安特生回信，還會提到 Touyats'ai Hutung 因女管家喪子，使得整家陷入弔喪的氣氛等等。¹²⁶赫定在追悼葛利普文字中，也把葛利普的住所說成像他自己在中國的家，來描述葛利普的親切好客。¹²⁷又說他家的聚會是個科學沙龍，討論的話題最後總離不開對新發現的看法。曾經參加的

¹²³ 例如在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ed. Claude Aragonnè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56), p. 103.

¹²⁴ 楊鍾健，〈科學家是怎样長成的？紀念葛利普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作〉，《科學》30.3（1948）：65-69，頁68。

¹²⁵ Sven Hedin, "Amadeus Grabau: In Memorium,"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7.11 (1947): 27-30, p. 27。

¹²⁶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p. 81.

¹²⁷ Sven Hedin, "Amadeus Grabau: In Memorium," p. 27.

楊鍾健也說那個地點「無形中成了北平一個文化中心」。¹²⁸而聚會氣氛雖然輕鬆，不過據說葛利普「請客談笑，飯後聊天，不到三句，就說地質或古生物方面的事，真是三句不離本行。」¹²⁹從本文分析的文獻即可看出，這群人即使聚餐，還是不忘將他們在地質、古生物、史前人類方面工作的材料加入菜色名單，大大發揮其想像力。¹³⁰

除了工作職務上的關係，以及這類室內聚會的討論之外，這群人也有組隊到野外進行田野考察的共同經驗。在某個意義上，視實地考察為基礎工作，不畏田野辛苦，才是他們共同分享的價值觀。而且這件事對於當時的中國地質學者意義尤大。丁文江在地質調查所出版的刊物《地質彙報》第一期（1919）序言中就提到李希霍芬當年對中國書生的評價，而以他這一代的中國書生終於可以走出書齋為榮。原來李希霍芬在其《中國》一書第一卷卷首曾經寫到：「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丁文江接著寫到，「現在可以證明此說並不盡然，因為我們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¹³¹

事實上，這群人當中大致除了葛利普因行動不便，較少有出田野的經驗，以及金叔初，因目前資料不足而無從得知，其他皆是「篳路藍縷啓山林」¹³²之人，而不是書齋書生。例如丁文江教導學生「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¹³³而這種堅持竟造成他自身死因之一。因為他為了親自勘查，在兩天內先是一口氣爬上一千多公尺高的衡山，後又下到斜深一百七十公尺的譚家山礦坑探勘，忽略了自身原有的動脈硬化問題，又因氣溫驟變而傷風，夜裡在密室使用煤爐取暖，疑似中毒，最後因為一連串醫療疏失與耽誤，而導致不治，享年僅四十八。丁文江的死，給他的朋友同儕帶來極大的打擊，尤其是地質界的同好。

至於翁文灝，據說也是十分注重實地調查之人。他在《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序言中就寫到：「欲圖斯學之進步，亦唯有擔斧入山，劈荊棘斬榛莽，以求益吾事實上之知識而已」。¹³⁴在抗戰時期的一篇文章還不忘鼓勵後進應有實地探勘之堅持：

¹²⁸ 楊鍾健，〈科學家是怎样長成的？〉，頁 68。

¹²⁹ 楊鍾健，〈科學家是怎样長成的？〉，頁 67。

¹³⁰ 雖然這可能是餐卡設計者一人的靈感，但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所有參與者的品味。

¹³¹ 丁文江該篇序言乃以英文寫成，此處引言是從胡適之翻譯，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28。

¹³² 取自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第五章標題。

¹³³ 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5。此句原為翁文灝描述丁氏在地質研究所的教學原則，後被胡適抄錄在其傳記中。

¹³⁴ 章鴻釗、翁文灝合纂，〈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北平：京華印書局排印本，1916）。此書是將地質研究所師生三年實地考察所得結果匯集成書，分系統、火成岩、構造、鑛產等六章敘述。

舉行各大山脈之調查時，往往須深入荒僻地域，人口稀少。生活艱苦，工作者勢須充滿冒險探險之精神，以尋求科學知識之滿足。此種精神實為中國地質學者所必備，我們絕不能徒託空言，遺棄實地，亦不能貪想安樂，畏行遠路。中國疆域寬廣，地質學者有普遍搜索的義務，故遙遠的旅行，繼續的跋涉，為中國地質學者不可避免的責任，必須勇往直前，盡力為之。¹³⁵

另外，德日進在田野工作似乎有時也會不顧危險。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德日進接受法國探險家蒙費德（Henry de Monfreid）邀約，到伊索比亞探勘可能的古人類遺址。其中有一洞穴正好有黃蜂窩佔據入口，為了移開黃蜂窩，只好在洞穴放火，逼走黃蜂。兩人因此遭來黃蜂攻擊，據說德日進被叮到臉都腫脹變形，可是未有一句抱怨之詞。¹³⁶

至於安特生，一個事例可以說明他的勇氣與決斷。有一次他在旅行途中被一隻瘋狗咬傷，為了避免狂犬病傳染，他立刻拿起旁邊燒得火紅的撥火棒，往自己傷口烙下去。¹³⁷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這些以自然科學為志業的工作者，對實際田野工作的注重，有時更勝於自己的安危。當時中國某些地區盜匪特別猖獗，中國地質調查所年輕優秀的學者因地質調查而遭土匪殺害的例子在機構同事間往往留下慘痛的回憶。¹³⁸本文所討論的人物雖無被盜匪殺害者，不過我們亦可由此推想他們為了堅持田野工作所需排除的困難。

除了講求實地調查外，他們共同分享的價值還有一點，就是特別講求合作，也就是傅斯年提過的「集眾」。¹³⁹他們瞭解科學是眾人合作的事業，尤其像地質學、史前考古這類的自然科學，從材料收集、野外考察、標本製定，到室內分析、繪製圖版、理論發表等等，需要許多人的合作。其中尤其是田野考察、標本比對和鑑定工作最需要有經驗的專家互相協助，才得以事半功倍。所以其學術成果的歸屬和發表，常常有

¹³⁵ 翁文灝，〈抗戰時期幾種地質工作的商榷〉，《地質論評》1940.5：271-276，頁274。

¹³⁶ 此事是蒙費德在德日進過世後的一次紀念座談中談到的，羅學賓（Pierre Leroy）將之轉錄於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p. 12。

¹³⁷ 見 George B. Barbour,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 p. 40。

¹³⁸ 地質調查所人員到田野工作而有意外或遭土匪殺害的事例不少，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遇害的趙亞曾（1898-1929），以及一九四四年遇害的許德佑（1908-1944）、陳康（1916-1944）、馬以思（1919-1944）三人。其中趙亞曾是葛利普的愛徒，亦受丁文江重視，其慘死令兩位老師久久不能釋懷。另外馬以思則是地質調查所歷史上唯一到過野外考察的女地質學家，不幸的是她第一次到田野就遭土匪殺害，年僅二十五歲。

¹³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3-10。引文在第十頁。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就是把地質學、生物學當作是歷史學該仿效的對象：「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多人共同掛名的情形。¹⁴⁰在當時中國分工未細、缺乏專門人才時，這些在中國相遇的中外學者相互依賴彼此的專長。丁文江就曾經跟胡適說過，他的研究需要有相當的設備和技術人員幫忙，若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他鑑定化石，以及繪圖員幫忙繪圖，他一個人是無法進行的。¹⁴¹安特生也曾經在其著作中感謝師丹斯基和葛蘭階幫忙田野挖掘和鑑定的工作。在安特生與德日進的往來書信集中，我們也可看到安特生特地將某些標本寄到法國，要聽聽德日進鑑定後的意見。另外前面也提過，德日進與葛蘭階也曾有書信往來，討論某個化石標本分類歸屬問題。¹⁴²而德日進在田野中無法確定自己對某個地區的地層判斷是否正確，特別邀請巴爾博一同前去勘測，以便與自己的觀察做比較。這樣的合作模式，還延續到他後來在非洲做的田野考察。這種重視專業、尊重同好、堅持精確的態度，在他們跨洲往來的書信中特別容易感受到。

不過，他們在聚會中時雖然氣氛融洽，並不表示他們在所有科學議題上都意見一致。例如德日進就為安特生在瑞典王太子的歡迎會上做的有關兩枚人齒的報告，主動提筆寫信給安特生，以他作為同行的立場，建議安特生要更審慎。那也是德日進給安特生的第一封信，開啓了兩人的通信記錄。後來步達生公佈新屬種的鑑定報告之後，安特生與德日進也在互通的信中表達疑慮。另外像是對中國文明與古人類從西方傳入的看法，步達生與安特生等人都認為應該是從西北傳入，而德日進則傾向從西南去追尋線索。再一個例子，便是前面提過的中國第四紀冰川有無問題。其實當時負責撰寫鑑定報告的巴爾博對李四光實地說明的印象很好，但礙於證據不足，所以無法當場認同李四光的解釋。¹⁴³這樣的謹慎態度後來卻被詮釋為帝國主義的傲慢，而忽略了西方學者之間也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這並不一定是帝國主義的問題。

從以上的事例可看出，當時這群地質、考古學家，不僅要在田野踏查時與大自然惡劣條件奮鬥，還要忍受中國國內軍閥割據、戰爭頻仍、盜匪猖獗的環境，若不是對求知求真的堅持，加上中國學者還有科學救國的責任感，恐怕無法持續不懈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城市內同好之間的相聚、餐飲之間的討論，就像是一種對文明的堅持，並且有機會還不忘奢侈地開開自己所從事之研究的玩笑，苦中作樂一番。

¹⁴⁰ 以德日進為例，在中國研究中曾經與他共同掛名發表文章的就有步達生、巴爾博、楊鍾健、裴文中、桑志華、羅學賓、湯道平（Maurice Trassaert）等人。

¹⁴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73。

¹⁴² 見前引之 The Granger-Teilhard de Chardin Collection。

¹⁴³ George B. Barbour,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 p. 91.

三、結語

孔恩（Thomas S. Kuhn）在其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後記中曾言：「爲了瞭解科學爲什麼會以它所表現出的那種方式發展，你根本毋需追究使每一個人做出一個特定選擇的個人經歷與人格細節，雖然那題目也很迷人。你必須瞭解的是一套特定的共享價值，與一個專家社群所共享的特定經驗的互動方式，它保證了這個團體中的大多數成員最後會發現某一套論證具有決定性。」¹⁴⁴寫下這段話的孔恩卻一直沒有爲他所言的科學社群提供明確的定義。然而同時期，我們也看到愈來愈多的科學社會學家試圖用量化的方式，或藉著論文引用次數，¹⁴⁵或藉著某些研究領域登記有案的成員結構來分析科學運作的動力，尤其是爲了探討從「小科學」到「大科學」時代，所謂的科學社群在規模上的變化。¹⁴⁶

事實上，群的特性極難捉摸，尤其對於一個建制化初期，或尚未完全制度化的學科領域來說，核心領導社群發揮的作用以及其成員間互動的狀況，不是只用論文數量可以評估的。本文利用書信往來中所附的一張紀念餐卡，企圖捕捉周口店發掘時代一個從實際一起工作的「小群」到擴大合作的「網絡」，其成員間的交遊情形。這些人士並不隸屬於同一個機構，也不隸屬於同一個國家，他們因爲科研工作在中國相遇，除了聚會分享研究心得與新知之外，他們重視分工與合作的群體特性，也表現在一起出田野、以共同掛名的方式出版、參加學會討論等等活動上。他們之間有私人友誼，也有少數專家之間的相知相惜，綜看他們之間來往的書信，橫跨歐、亞、美、非四大洲，有時只爲了問一個鑑定的問題，有時要求寄一個標本的複製模型，有時寄送新出版的報告或著作，有時描述己身所在的當地學界近況等等。中國地質、古生物、史前考古學界當時具有領導研究方向、樹立學術規範的小群份子分工與跨國的特性，從這張餐卡上簽名人物之組合可以一覽無遺。

從這樣一件在機構公文、學會報告或刊物論文中不易看到的文獻中，我們也看到制度化後所進行的量化分析看不到的面向。除了這一小群足跡遍佈全球的科學工作者

¹⁴⁴ 孔恩原著出版於一九六二年，後記寫於一九六九年，此處參考的是中文版：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爲、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所引文字出現在頁260。

¹⁴⁵ 主要是 Eugene Garfield 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論文引用次數量化研究，見 Eugene Garfield, *Citation Indexing: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New York: Wiley, 1979).

¹⁴⁶ 主要有 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Diana Crane, *Invisible Colle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等。

彼此的交誼和工作情趣，它讓我們看到如赫定這類旅行探險家或像金叔初這樣的科學贊助者的重要性，他們是以機構成員為分析對象的著作中不會納入考慮的人物。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早期發展階段，野外勘查和採集是很主要的部份，所以這些旅行探險家與專職的地質學、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研究者之間的交遊，也應該成為研究該領域科學活動的一個部份。¹⁴⁷另外，如金叔初這樣的博物愛好者和科學事業贊助者，讓我們看到在戰亂中國內，科學文化在某個階層內已經有其深厚基礎。

莫騰（Robert K. Merton）在其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專著《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¹⁴⁸曾經提示科學運作與其所在的特定歷史社會裏其它大領域（宗教、政治、經濟、軍事）有相當的關係，科學並非獨立運作的事實。這個論點經過後代科學社會學家反覆捉摸，已經逐漸翻新莫騰時代的研究取徑。近年來綜合的科學研究（sciences studies）的部份作品便進一步指出文明性與科學實踐之間的關係，例如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真理的社會史》一書中即說明波以耳與霍布斯所處的十七世紀英國，社會中紳士規範如何成為實驗哲學提倡者的實作資源。¹⁴⁹若以此角度來思考，被公認為是中國近代「發達早而進步速」的廣義地質學領域，它的科學社群與大環境的關係又是如何？

在二十世紀前期，軍閥割據、戰爭頻繁的中國社會，為何有地質學，乃至於與其相關的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等令人矚目的發展？除了因為地質學有其經濟上的實用價值外，實在難以讓我們看到這群有帶頭作用的科學家與當時大社會之間的同質關係。反而是讓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一炮而紅的周口店發掘計畫，其緣起與國際間一群研究古生物、古人類學的人士對人類起源的探尋有緊密關連。從這群科學家對科學堅持的態度、聚會的文明程度、餐卡表現出的趣味和想像，我們可以看出，若那個時代因有耀眼的發現成績而被後人認為是一個令人豔羨的時代，那並不是當時中國的大環境給予的，而是少數幾個稀有人物因緣巧合相聚後一起創造出來的。至於當時遠來的外國學者，他們不是融入到中國當地一個現成而舒服的研究環境，而是企圖排除萬難，共同為有普世價值的科學事業而努力，而中國地區的地質學和史前學正是其中的一部份。

¹⁴⁷ Jean-Marc Drouin, “De Linné à Darwin: les voyageurs naturalistes,” in Michel Serres (ed.), *Élément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Paris: Bordas, 1989), pp. 479-501.

¹⁴⁸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 Fertig, 1970, first published in 1938).

¹⁴⁹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透過這張餐卡，我們彷彿可以看到，在大環境紛擾的情況下，堅持科學研究高度的一群中外紳士，在一名想像的遠古淑女精神引領之下，一步一步探索我們現在稱做中國的這塊土地上幾千年、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曾經有過的人類文明場景……

後記：本文初稿曾於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四日在史語所講論會口頭報告，後投稿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同年七月獲兩位審查人審查通過。然因其中一位審查人認為文章性質較適合刊登於《古今論衡》，後筆者又因其他研究計畫纏身，遲至今夏才將修訂稿轉致此刊。適逢史語所成立八十五周年，謹以此文表達慶賀之意。